

王充

安徽人民出版社



王充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合肥

王 充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阜阳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frac{1}{4}$ 字数: 45,000

1974年10月第1版

197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

统一书号: 11102·13 定价: 0.14 元

目 录

论王充的反儒斗争·····	钟 达(1)
戳穿孔孟之徒制造的反动谣言	
——读王充《论衡》一书札记·····	薛 平(10)
王充《问孔》、《刺孟》选注	
·····	马鞍山市第二钢铁厂工人理论组 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法家著作评论组(15)
讨孔的战斗檄文	
——读王充的《论衡·问孔篇》	
·····	天津大沽化工厂工人评论组(30)
我国古代杰出的反孔檄文	
——读王充的《问孔篇》·····	周 之(35)
王充的《刺孟》·····	施林兴(40)
王充在文学领域里的反孔斗争·····	蒋立甫(43)
王充传·····	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员 陆晓松(55)

论王充的反儒斗争

钟 达

王充是东汉前期的唯物主义者，是公开举起“伐孔”、“刺孟”的战斗旗帜的进步思想家。

王充所处的时代，是孔孟儒学取得独尊地位的时代。

西汉王朝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它继承了秦王朝的政治路线，从汉高祖刘邦到汉宣帝刘询都是尊法的。到了西汉末期，随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发生了变化。世家豪族地主的势力越来越大，土地大量兼并和集中，农民被迫流离失所。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激起农民的反抗，到处举起起义的火把。地主阶级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吓破了胆，他们一面残酷地镇压农民起义，一面乞灵于孔孟之道，大肆提倡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孔孟儒学，主要是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作为麻痹、瓦解广大农民斗争意志的精神武器。从汉元帝刘奭开始，儒家思想在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已经占了统治地位。汉光武帝刘秀依靠世家豪族残酷镇压了绿林、赤眉起义，建立东汉政权以后，对儒学更加大力提倡，竭力宣扬被称为“图讖”的神怪预言。谁对孔丘和儒家那一套反动迷信的东西稍有怀疑和不敬，就要被扣上“非圣无法”的罪名，有丢掉脑袋的危险。公元七十九年，汉章帝刘炟亲自主持了大规模的白虎观经学讨论会，把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论加以条理化，儒学的地

位也提得更高。

面对这股独尊儒术的逆流，王充挺身而出，不怕讥笑，不怕迫害，写出了《论衡》一书，把矛头直接指向儒家的祖师爷孔丘，提出：“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表现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勇敢战斗精神。

在《论衡》一书中，最有光彩的篇章是《问孔》、《刺孟》。在这里，王充以孔丘、孟轲的代表作《论语》、《孟子》为靶子，从他们的言行中找出“相违”、“相伐”的大量事实，运用形式逻辑，尖锐地揭露了他们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孔丘不是宣扬“仁义”吗？他口口声声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是，却很想到佛肸和公山弗扰那里去做官。子路问他，你不是说“亲身做坏事的人，君子不去他那里”吗？他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一会说是想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一会又赤裸裸地宣称，我不是瓠瓜，不能挂着做样子不吃饭。王充指出，孔丘讲话没有准，办事也不会有准。他把自己比做瓠瓜，说做官是为了混饭吃，“何其鄙也”；他同公山弗扰、佛肸等坏人勾勾搭搭，又“何其浊也”。在这里，王充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看出孔丘在政治上的反动本质。实际情况是，公山弗扰和佛肸，当时都是企图推翻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叛乱分子，孔丘想到他们那里去做官，乃是为了搞垮鲁国和晋国的革新势力，实现其“使周代的制度在东方复兴”的野心。孔丘这个维护奴隶制的顽固派，对于革新势力是恨之入骨的。涉及到政治问题，他就完全抛掉“仁义”的伪装。以宰予昼寝为例。宰予打瞌睡本来是一件小事，孔丘却摆出一副恶霸脸孔，大骂宰予是“不可雕”的“朽木”，是“粪土之墙”。王充认为，宰予犯了打瞌睡这样的“小过”，

孔丘把他比做不堪造就的朽木粪土，是小题大做了，不足以服人。实际上，孔丘骂宰予是事出有因的，是因为宰予政治上同他有分歧，不同意他的政治主张。

孔丘不是宣扬“礼”吗？他的最得意的学生颜渊死了，他哭得好象很伤心。可是，当颜渊的父亲请求孔丘把车子卖掉给颜渊买口外棺的时候，孔丘却马上板起面孔，一口拒绝，说什么“大夫出门不能步行”。还对别人说：“我儿子死也没有给他买外棺。”王充指出，孔丘为了保持大夫身分，不肯卖掉车子为学生和儿子下葬，是贪恋官位，爱摆架子。他质问孔丘：你说“君子杀身以成仁”，为什么不能放弃爵位来坚持“礼”呢？在这里，王充尖锐地揭露了孔老二言行不一及其所宣扬的“礼”的虚伪性。但是，他没有从政治上看到“礼”的反动本质。事实上，孔丘的“礼”是为政治服务的，他鼓吹“复礼”，就是要复辟西周奴隶制。

孔丘不是宣扬“信”吗？其实他的假话是说得最多的。孔丘曾经叫嚷要跑到中原以外的地方去。王充就质问他，你的政治主张在中原还行不通，在中原以外的地方怎么能行得通呢？你不是说，那里的事情比中原更难办吗？好办的地方都行不通，难办的地方就行得通吗？王充正确地指出：孔丘并不是真的想到中原以外的地方去，而是有意撒谎。他骂别人是强嘴利舌的“佞者”，其实他自己正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佞者”，一个伪君子。说假话，这是一切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共同特点。他们为了实现其反动政治主张，总是嘴上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孟轲就曾经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叛徒、卖国贼林彪也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恰巧反映了这些没落阶级代表人物的腐朽性和虚弱性。

王充是反儒斗争的战士。他虽然没有从路线上批判孔丘的反动本质，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这样大胆地指着孔丘鼻子，骂他又鄙、又浊、又贪、又佞，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这种尖锐的批判，一直激励着后来进步的思想家的批孔斗争，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是深远的。

在《刺孟》篇里，王充对孔丘的继承者孟轲所宣扬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反动观点的批判，是很有光彩的。孟轲说：每过五百年一定会有英明的帝王出现，那中间一定有闻名于世的人产生出来。王充认为，孟轲的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帝喾、尧、舜、禹都是“王者”，他们是“继踵而兴”的，没有隔五百年；由周到孟轲已经过了七百年，也没有兴起“王者”。五百年是上天生“圣人”的期限吗？如果是的话，到了期限，上天为什么不准时生一个“圣王”呢？王充指出，孟轲满怀“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政治野心，由于没有掌握到政治权力而“怀恨”，所以尽说些经不起事实考验的骗人的“浮淫之语”。王充批驳孟轲所发挥的这些思想，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作为封建社会的先进思想家，王充主张革新，反对倒退，因此他敢于向儒家的“天才论”宣战。修正主义的头子林彪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亦步亦趋地跟在孟轲之后，叫嚷“天才”几百年、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实际上是大树特树他自己。他这种反动观点，正是王充在一千九百年以前在批判孟轲时就驳斥过了的。当然，王充还不可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彻底地批判这种反动的“天才论”，这个任务只能由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

王充的《论衡》，有力地驳斥了孔孟天命论在汉代的翻版——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

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论，把天说成有目的、有意志的

最高主宰，把世间万事万物说成是天有意识地创造和加以安排的。人如果顺应天的意志，天就降福，否则就降祸。他还炮制了“君权神授说”，宣扬“王者承天意以从事”，谁反对皇帝就是逆天，假借“天意”来肯定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性和合理性。

王充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吸收了汉代天文学和医学的成果，针锋相对地驳斥了这些谬论。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气形成的，天和地一样是没有感觉、目的和意志的物质实体。“天道，自然也，无为”（《谴告》），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和发展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创造和安排世界的最高主宰。“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明雩》），孔丘和儒家的经典动不动就讲天命，其实只是吓唬和愚弄人民罢了。这样，王充就继承和发挥了荀况“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观点，有力地冲击了君权神授的基础。王充还针对儒家提出的天能降祸降福以及自然灾害是上天对人君的“谴告”的观点，考察了当时所谓灾异，如日月食、地震、雷雨等，指出这些都是自然现象，绝不是上天的“谴告”。他认为，儒家编造的“谴告”是和“礼”一起搞出来的。上古时候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谴告”。只有“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灾疑时至”，即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矛盾重重，灾异很多的情况下，才“造谴告之言”。所以他说：“谴告之言，衰乱之语也”（《自然》）。就是说，“谴告”的出现，反映了统治阶级政治危机的加深。王充虽然没有揭明反动统治阶级利用“谴告”转移人民斗争视线、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阶级本质，但他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指出它是同政治斗争有着密切联系的，在当时，这也是很高明的见解。

王充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他坚决宣传无神论，反对当时流行的宗教迷信。他提出了关于形体和精神关系的著名论断：“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论死》）他指出精神是不能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从而否定了一切鬼神的存在，这是对天人感应神学的有力批判。他的战斗成果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王充以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如范缜、吕才、张载、王夫之，都受过他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

坚持法家主张革新、前进的观点，反对儒家“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的历史倒退论，也是王充《论衡》一书的鲜明特点。

董仲舒叫嚣“奉天而法古”，“天不变，道亦不变”，大肆鼓吹“今不如昔”的谬论。他诋毁汉朝由于继承了秦的法治而腐败得象朽木泥墙一样，无法修补，只有推行孔孟之道即开历史倒车是唯一的出路。王充是肯定商鞅的耕战政策的，认为它取得了“为秦开帝业”的重大成果。这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秦王朝的进步作用。他指出，怀有今不如昔、汉不如周的成见的俗儒，认为凡是古代的东西都好，越古越好，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在《宣汉》、《恢国》等篇中，王充高度评价刘邦打败项羽分裂势力、建立中央集权制统一国家的成就，对汉朝的建立和西汉前期巩固中央集权、打击分裂割据势力的措施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秦汉之际，功奇行殊”（《齐世》），但被儒家贬低和轻视了。他从各方面把汉代和周代作了比较，指出汉代国土的开辟远远超过了周代；在生产力提高方面，周代的荒野地区到汉代已有很多开成肥沃的田地；汉代在精神文化上也比周代发达。一切都证明“汉高于周”，汉“在百代之上”。他还从社会物质生活

条件的不断发展，举出古代的人吃不上五谷，也没有衣服穿，现在却“穿地为井，耕土种谷”，“有布帛之饰”等事实（《齐世》），肯定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驳斥了“今不如昔”的谬论。他嘲笑儒家说，你们“上则求虞夏，下则索殷周”（《齐世》），对古代的东西津津乐道，但对于当代的成就却反而全不看在眼里，“知古不知今”，简直是昏昧透顶！儒家说“汉不及周”，鼓吹一代不如一代，是十足的反动的历史倒退论。王充肯定“汉高于周”，汉“在百代之上”，则坚持一代胜过一代，继承了法家的反复古主义的传统。

王充的反儒斗争，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的。这场斗争，实质上是先秦以来的儒法之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王充反对儒家的斗争是不彻底的。他在《问孔》、《刺孟》等篇中，对孔孟思想作了尖锐的批判，主要是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揭露孔孟言行的矛盾、言论和事实的矛盾及言论本身的矛盾，没有抓住路线问题。在《非韩》篇中，王充对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态度显然和对待儒家的态度不同，但是对韩非的政治主张的评价是不正确的。他指责韩非只讲耕战，不讲礼义；只讲刑，不讲德，认为儒者是代表礼义的，不可缺少，不同意韩非关于儒居于“五蠹”之首的观点。这恰恰暴露了他不能从路线上分析问题。在讲到秦统一六国时，他也没有抓路线问题，只说是“秦以兵强，威无不胜”。至于秦为什么强，他就说不上来了。

为什么王充会写出《非韩》篇呢？

第一，他没有看清法家和儒家是互相对立的政治力量，没有把儒法斗争看成路线斗争。法治还是礼治，这是从先秦

到西汉儒法斗争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其实质就是巩固地主阶级专政，还是复辟奴隶制。“复礼”是奴隶制复辟势力抛出来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而“明法”则是新兴地主阶级巩固封建制的战斗口号。韩非认为“法”是最高的原则，他说：“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韩非子·问辩》），而斥儒家的“礼”是“乱之首”（《韩非子·解老》），观点十分鲜明。王充却企图把这两个对立面调和起来，把它们说成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因而指责韩非“废德”“任刑”是走偏了方向。在这个问题上，王充比起韩非来，就后退了。

第二，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儒家的思想影响。随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和奴隶制残余势力日益走向妥协，联合起来镇压农民起义。这时，儒家也将“礼治”改头换面，打扮成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德治”，以适应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他们吹嘘“德治”，说什么“汉德宽厚，民无二心”，强调“德治”有巩固统治阶级内部团结和欺骗人民的作用。这一转变对东汉前期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桓谭、王符等人也都发生了影响，对王充也不例外。尽管王充曾反驳过儒家关于“德治”的吹牛，指责孔老二要人民饿着肚皮谈礼义，但是，他还是受到了“德治”的观点的影响，并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看待历史上儒法两家关于法治和礼治的争论，结果竟得出了与他自己的反儒斗争精神相矛盾的结论。

历史经验表明，儒法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儒，而不抓儒法两条路线斗争，不从儒家的阶级本质上批判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是不能彻底打败儒家思想的。而这正是为什么王充勇敢地举

起了批判儒家的战斗旗帜，但反儒不彻底的关键所在。这个彻底批判儒家思想的历史任务，只有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毛主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把历史经验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就有可能完成过去一切时代的先进思想家们所不能完成的任务。

（《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八期）

戳穿孔孟之徒制造的反动谣言

——读王充《论衡》一书札记

薛 平

鲁迅说过：“‘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同他们的祖师爷一样，都是造谣的能手。他们不是编造一些荒诞无稽的故事，就是歪曲篡改历史，来为他们搞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服务。他们一方面是“用种种的白粉”给孔老二“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一方面又挖空心思地给秦始皇和其他法家代表人物栽赃抹黑。对于儒家这样卑劣的手段，许多法家代表人物给予了坚决的揭露和批判。东汉时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读一读他的《论衡》，对于我们今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揭露和批判儒家的反动性，揭露和批判林彪这样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所制造的谣言和诡辩，是会有所启发和借鉴的。

常言说，墨写的谎言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反动派所制造的谣言鬼话，不是无中生有，就是歪曲篡改了事情的本来面目。要把它戳穿、批透，就需要以事实为依据，进行深入分析。王充的文章就注意了这一点。象对“焚书坑儒”这一事件，孔孟之徒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胡说什么秦始皇“欲灭诗书，故坑杀其人”，完全歪曲了历史真相。王充在《语增》

篇中详细论述了这一事件的来由及过程，深刻地指出：“燔诗书”是因为“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即人民）”，“坑士起自诸生为妖言，见坑者四百六十七人。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王充用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儒家对秦始皇的攻击。

谣言尽管是精心伪造的，但无论如何不能编得那么圆。只要抓住它的破绽，层层解剖，就一定可以剥去伪装，戳穿谎言。王充就善于这样做。孔孟都自诩为“天命”的“圣人”，他们的徒子徒孙们也编出许多古怪离奇的“故事”来证明他们的祖师爷是“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圣人”，好象谎话重复多遍就会变成真理似的。其实这完全是徒劳的。只要用事实一对照，他们的这些谎言便象肥皂泡一样立即破灭了。有这么一段孔老二能掐会算的“故事”，说什么孔老二在临死时留下一句话：“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后来这话果然“应验”了，秦始皇到鲁国打猎时，看了孔老二住的房子，归途中走到沙丘这个地方就死了。好家伙，真把孔老二给说神了，居然能在秦始皇出生前二百多年就算定了他要死在半道上。但是，假的就是假的，谎言终归成不了事实。王充详尽地考证了秦始皇死亡那年的出巡路线，发现他这一年根本没有到过鲁国的地方去打猎，于是反问道：“始皇不至鲁，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床，颠倒孔子之衣裳乎？”就这样，王充用铁的事实粉碎了后世儒生所编造的谎言，扯下了孔老二“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先知先觉”的画皮。

还有一个吹捧孔老二是“千里眼”的“故事”，编得神乎其神。说是有一回孔老二和颜渊同登泰山，孔老二连距泰山千里之远的吴昌门外拴了一匹白马都看得清，颜渊却拚命

睁大了眼睛也看不见。结果下山之后，颜渊因为用眼过度，头发也白了，牙齿也掉了，不久就死了。当时科学还不够发达，孔老二的名声又那么大，加上颜渊又真是死在孔老二之前，所以这个“故事”的确有一定的欺骗性。王充在《书虚》篇里用浅显易懂的科学道理，分析批判了这个谎言的“虚妄”。王充说：“盖人目之所见，不过十里，过此不见。”把孔老二说成是个“千里眼”，完全是瞎说八道。至于为了证明这个谣言，把颜渊的死也给扯上了，更是生拉硬拽。王充说：“颜渊用目望远，望远目睛不任，宜盲眇。发白齿落，非其致也。”就是说，颜渊用眼拚命往远处看，伤了眼，顶多会瞎，绝不致于白了头发掉了牙，造成死亡。分析得有理有据，一下子就把孔孟之徒吹的牛皮给捅破了。

东汉初年，儒家编造的这类谣言已经满天飞了，流毒甚广。王充清醒地看到孔孟之徒“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于是奋笔写出了《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

“实事求是”，用事实来说话，是《论衡》一书的突出特点，反映出王充在思想认识路线上所坚持的是唯物论的路线。尽管王充的这种思想还很朴素、直观，但对儒家所尊崇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不能不是个沉重的打击。

王充还长于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抓住儒家言论中“上下多相违”、“前后多相伐”的自相矛盾之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露儒家的欺骗性。尤其是在《问孔》、《刺孟》等文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把批驳的矛头直指儒家的祖师爷——孔孟，撕破了他们的种种伪装，勾画出了儒家妖言惑众、欺世盗名的骗子嘴脸。由于王充没有能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来认识孔孟之徒制造谣言的反动目的，因此他的批判就不

可能抓住儒家的反动实质，不够深刻。虽然如此，王充的文章已经明确地告诉人们儒家是骗子，提醒人们要揭露儒家要弄的阴谋诡计。王充这种敢于向孔孟之道公开宣战的反潮流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造谣，是一切反动没落阶级搞复辟倒退的惯用伎俩。时代在不断前进，他们要想开倒车，就只能乞灵于谣言和诡辩，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历史上的儒家是这样，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本来明明是钻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却偏要自我吹嘘为“志壮坚信马列”的“英雄”。他的死党也为他“抬轿子”、“吹喇叭”，无耻地篡改和伪造历史，把他说得“一贯正确”，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制造反革命舆论。林彪自己供认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造谣正是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们妄图搞复辟倒退，挽救自己覆灭的一根救命稻草，反映出他们腐朽、虚弱的本质。正如列宁所说：“他们没有能力同我们进行面对面的争辩，只好施诡计，搞阴谋，耍无赖”。

反动派要造谣，是由他们的本性所决定的。革命的人民要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听见谣言，不仅不能信，还要追根溯源。经过一番认真的分析研究，懂得了敌人的反革命策略，我们方能用革命的策略去战胜他们。鲁迅在谈到自己同反动派作斗争的经验时曾经说过：“我就是常看造谣专门杂志之一人，但看的并不是谣言，而是谣言作家的手段，看他有怎样出奇的幻想，怎样别致的描写，怎样险恶的构陷，怎样躲闪的原形。”既是谣言，总有伪装，不分析研究，就不能揭露造谣者反动的用心，粉碎其阴谋。今天，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这样现代的儒，要把反动没